



图1《丙午年》特种邮票之“驰跃宏图”



图2《丙午年》特种邮票之“万骏臻福”



图3《庚午年》特种邮票



图4《壬午年》特种邮票之“马到成功”



图5《壬午年》特种邮票之“壬年大吉”



图6《甲午年》特种邮票

方寸间的文脉传承

——马年生肖邮票解析

任萌

生肖邮票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铭刻时代精神的国家名片，是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重要收藏门类。马，作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，在四轮生肖邮票发行历程中，以各具神采的艺术形象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近期入藏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2026年《丙午年》特种邮票，与馆藏前三轮马年生肖邮票共同构成了跨越三十六载的完整序列，生动展现了生肖文化在方寸之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也为研究我国邮票设计史、印刷工艺演进和时代精神表达提供了珍贵实物见证。

《丙午年》特种邮票：全民共创机制下的新时代馆藏

2026年1月5日发行的《丙午年》特种邮票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，不仅在于其艺术表现，更在于其标志性的诞生机制——中国邮政首次完全打破专业壁垒，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图稿，并创新性地采用“大众评审+专家评审”双轨制评选模式。这一变革，使生肖邮票从过往多为名家执笔的“命题创作”，转变为“全民文化共创”。

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169位设计者的440幅投稿作品，参与者涵盖各行各业、各个年龄段。在评审环节，101位通过网络公开招募产生的大众评审，与由艺术、民俗、邮票设计等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专业评审团共同履职。这种双轨并行的模式，既确保了作品的艺术高度与专业性，又赋予了设计以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时代温度。

在这场汇集民智的全民竞技中，设计师王红卫与赵恩重的联合作品最终脱颖而出。对于属马的王红卫而言，此次设计是一次“圆梦之旅”：“马不仅是一个生肖动物，它是一种有灵性的伴侣，象征着真诚、激情与活力。我的妻子、女儿与许多亲人都属马，外婆留下的布偶马至今陪伴着我。这份情感连接，让我对‘马’的理解已超越图案本身。”早在2014年，王红卫就曾设计甲午年贺年邮资图，这份情感积淀使他的创作水到渠成。

在艺术语言上，《丙午年》邮票的设计没有简单地重复过去，而是主动求新求变，在艺术风格上大胆突破。邮票全套两枚，分别名为“驰跃宏图”与“万骏臻福”。设计师赵恩重阐释核心理念：“我们着力突破前三轮马票多以稳重、静态立马为主的视觉范式，旨在塑造极具速度感与力量感的奔马形象，以此具象化地彰显中华民族自古至今那股蓬勃向上、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。”

第一枚“驰跃宏图”(图1)，以一匹极具视觉张力的艳红色骏马为主体，昂首嘶鸣，四蹄腾空于祥云之上，背景衬以华丽繁复的“天华锦”非遗纹样。第二枚“万骏臻福”(图2)，则在橙红色底上描绘了黑、白、棕三匹骏马齐头并进的奔腾画面。王红卫解读道：“它们是一个有机叙事整体。第一枚中的红马是鲜明的‘领头雁’；第二枚中的三匹马代表着紧随其后的万千马主。两枚并置，共同构建出从‘一马当先’到‘万马奔腾’的完整意象。”

为实现这一构思，设计师在微观细节上投入了巨大心力，“从马头扬起的角度、脖颈肌肉的线条、到鬃毛飘动的节奏、马尾摆动的力度，每一处都经历了无数次的推敲与修改。力求让所有的细节都服务于更强的视觉节奏感与空间纵深感。”

此次设计的影响远不止邮票本身。入围及最终的设计元素，被广泛应用于中国邮政的贺年卡、系列集邮文创产品以及“寄贺卡”线上小程序等多元载体，使生肖文化以更加丰富、现代的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，完成了一次从专业设计到全民共享的“文化共振”。

馆藏珍品系列：前三轮马票的工艺与美学流变

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系统收藏的既往三轮马年生肖邮票，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设计理念与工艺特色，具有重要的对比研究价值。

《庚午年》特种邮票：稚拙灵动的春之信使

将时光指针拨回至1990年1月5日，中国邮政发行了首轮生肖邮票中的《庚午年》特种邮票(图3)。这套仅有一枚的邮票，在设计史上具有独特地位：它是第一套由专业邮票设计师独立创作的生肖邮票，开启了设计师个人艺术风格与生肖主题深度融合的先河。

设计师邹建军从陕西陕北地区民间“小马玩具”中汲取灵感，创造出一匹通体乌黑油亮、配以火红鬃毛与雪白蹄脚的小马驹形象。小马精神抖擞，颈系红轭头，背搭饰有红荷花纹的马鞍，全身披挂，喜气洋洋。邮票以一片翠绿色铺满底色，象征着广阔的草原与生机勃勃的春天，又为黑色主体提供了鲜明而舒缓的视觉背景。

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，这套邮票采用影写雕刻版印制，绿

底、黑马、红鬃、白蹄的搭配对油墨纯度与印刷套准精度提出了严峻挑战。最终成品色彩明快、界限清晰，展现了当时印制工艺的高水准。邹建军还精准捕捉了一个充满故事性的瞬间：小马的前蹄微微抬起，后腿蓄力，头部轻转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奔跑向前。这一“蓄势待发”的动态处理，不仅赋予了邮票鲜活的生命力，更隐喻着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，充满活力、期待迈出新步伐的时代精神。

《壬午年》特种邮票：民间工艺与书法的融合创新

进入第二轮生肖邮票周期(1992—2003)，中国邮政推行了更为系统化、规范化的设计策略，确立了一套“两枚”的形制，并制定了“两年平面(图案)、两年立体(工艺)”的生肖形象呈现规律，以及“篆、隶、草、楷三年一变”的书法字体轮换规则。2002年发行的《壬午年》特种邮票，是这一系统性理念的杰出代表，成功地将地方民间工艺与传统书法艺术融为一体。这套邮票的成功，始于设计师王虎鸣在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室的一次偶然发现——一尊落满灰尘的陕西凤翔泥塑马。这尊泥塑马出自当时已72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泥塑(凤翔泥塑)代表性传承人胡深之手。

第一枚邮票“马到成功”(图4)以这尊凤翔泥塑马为主角。设计采用白底黑线勾勒泥塑本体，高度还原其质朴神韵。为强化节日气氛，背景辅以饱满鲜亮的大红色，使黑白主体在红色的映衬下格外跳脱醒目，极具视觉张力与民俗喜庆感。

第二枚“壬年大吉”(图5)则聚焦于汉字之美。中心是一个笔力遒劲、结构端庄的楷书“马”字，置于传统红色斗方之中。背景中，若隐若现地散落着篆、隶、行、草等不同字体的“马”字，仿佛一场跨越千年的书法微展览，营造出丰富的层次与深邃的文化空间。

这套“一图一文”“一俗一雅”的邮票，不仅完美践行了第二轮的设计规则，更使凤翔泥塑这一古老民间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传播，成为邮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。

《甲午年》特种邮票：古塑精髓与现代工艺的匠心融合

2014年《甲午年》特种邮票(图6)在第二轮生肖邮票中脱颖而出。它首先在形式上革新——采用了36毫米×36毫米的方形票幅与纯净的白色底色，视觉上更加简洁、现代、国际化。

其造型灵感源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一——唐代陶俑与唐三彩马。设计师撷取了唐马俊朗秀美的面庞、饱满雄健的筋骨、优雅含蓄的体态等经典特征，塑造出一匹气宇轩昂、静中寓动的白马形象。马身装饰富含传统吉祥寓意：马鞍披挂上的牡丹纹样象征着“富贵吉祥”；马鞍前后绘有的蝙蝠纹样，暗合“马上得福”的美好祝愿。

该套邮票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印制工艺的突破性尝试。采用影写版印制，并创新性地使用了特种银浆油墨，这使邮票画面中的白色骏马，在不同光线和观赏角度下，呈现出微妙而迷人的金属光泽变化，仿佛一匹真正的神骏皮毛下流动着银色光辉。这种“随光而动”的视觉效果，是古代审美精髓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获得全新表达的典范。

馆藏研究视角下的价值与意义

从馆藏研究的角度看，庚午(1990)、壬午(2002)、甲午(2014)、丙午(2026)四轮马年生肖邮票，恰似一部以十二年为一章的宏阔交响曲，每一乐章都激荡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音符。《庚午年》的民间稚拙与盎然春意，呼应着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焕发的朴素活力；《壬午年》的工艺与书法对话，彰显了世纪之交文化自觉下对传统资源的系统梳理；《甲午年》的古塑新绎与科技流光，展现了在经济腾飞年代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译的自信探索；《丙午年》的全民共创与动态升华，则深刻契合了新时代倡导的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。

四套邮票，题材统一，精神内核一脉相承——皆是对“龙马精神”“马到成功”“自强不息”这一民族集体性格的礼赞。然而，它们的艺术语言、设计理念、工艺技术乃至诞生机制，却随着时代脉搏而清晰流变。这方寸之间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的生动写照。

如今，以生肖邮票为媒介的中华文化传播已蔚为大观。据统计，全球已有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邮政机构发行过生肖邮票，这些承载着异域风情与东方文化基因的外国生肖邮票，构成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每年生肖邮票的发行，早已超越集邮范畴，成为一场连接全球华人的情感仪式和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事件。最新发行的《丙午年》邮票，以其全民参与的基因、时代精神的气韵和精湛的艺术表达，正是中国向世界递交的又一张充满活力与温情的“文化名片”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)

当除夕钟声响起：景云钟的千年共振与文物活化

曾乐洋

春节，是亿万中国人心中最隆重的岁时仪式。除夕春晚高潮时分，男女老少围坐荧屏前，静待零点钟声冲破夜空——洪亮清越的声响，承载着对过往的感恩，寄托着对未来的期盼，融入民族血脉的听觉记忆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这响彻神州的除夕钟声，源自一件跨越千年的国家宝藏——铸造于唐睿宗景云二年(711年)的景云钟。这一承载盛唐气象与古人智慧的青铜大钟，何以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完成古今对话?这背后是文明传承、文物活化与文化认同的深刻演绎，更是一场注定的精神共振。

传统溯源：新年钟声的文化源流

“时间之音”与“国家礼器”的双重使命。在中国文化谱系中，钟自诞生起便超越乐器范畴，成为权力与礼制的核心象征。《周礼》载乐官“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”，明确钟磬之乐的核心功能是沟通天地祖先、调和阴阳的国家祭祀礼仪，而非娱乐之用。像景云钟这样单独悬挂、体型恢宏的巨钟，古称“镛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“賁鼓维镛……于乐辟雍”的记载，再现了国家级学宫中文武礼乐的庄严场景，为后世独立大钟奠定了国家性、典礼性的基因底色。

南北朝时期，钟的功能发生关键转变。《南齐书》记载，齐武帝因宫室深邃难闻端门漏刻，遂于景阳楼悬铜钟夜间报时，将象征国家礼制的钟赋予公共计时职能。自此，钟声既回荡于祭天祭祖的神坛，也伴随黎民百姓的晨昏作息。而此后二百多年之后诞生的景云钟，正是这“国家礼器”与“时间号令”双重使命的集大成者，以其身、其文、其声融合两种核心意义。

寺院道观的“岁除之钟”融合多元文化。现代新年鸣钟习俗，蕴含着自然节律与宗教修行的双重意涵，这一传统的确立与佛教中国化进程密切相关。隋唐时期，汉传佛教寺院“晨钟暮鼓”制度成型，钟声被赋予警醒妄念、增长智慧、普度众生的宗教功能；在道教体系中，钟声承载通神达圣、召集神灵、调和阴阳的仪轨规范。景云钟作为唐代皇家道观景龙观的祀典重器，其钟声本质是“天人感应”宇宙观的实践，是沟通天地、护国佑民的神圣仪式，既具备通神治世的祭祀功能，又承载祈盼国泰民安的祝福诉求。这种双重属性使景云钟超越单一宗教界限，成为融汇多元文化的听觉符号，为日后成为全民新年钟声奠定了深厚基础。

传统延续与转化但未改祈福本质。从王权象征到寺院仪轨，从国家祭祀到百姓作息，钟声穿越千年时空，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迥异文化内涵。尽管形态与场景不断变迁，但钟声礼法的功能与祈福人间烟火还在一脉传承并改进创新。这种根植于文化传统的核心基因，正是新年钟声跨越朝代更迭依旧焕发活力的根本原因。

景云钟的盛世之音

景云钟的诞生与传承。景云二年，唐睿宗李旦诏令铸钟铭祥瑞。据传，其灵感源于皇帝巡幸终南山周至地区时，夜梦祥云满天的吉兆。景云钟因传奇而显神秘，更以无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价值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名钟”——它是迄今已知唐代唯一由皇帝亲自撰文并书写铭文的青铜大钟。自景龙观悬钟伊始，景云钟与唐王朝国运紧密相联，它见证开元盛世的万国来朝，历经安史之乱的动荡漂泊，在历代迁置与战火中辗转流传，却奇迹般完好保存至今。一千三百年的生命轨迹，使景云钟从皇家法器升华为承载民族记忆的“活化石”。

铭文与纹饰承载国家祈福的视觉表达。景云钟正面镌刻292字铭文，是唐睿宗李旦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。铭文记述了铸钟始末与景龙观概况，又以“飞廉崩炭，屏翳管钲”的神话笔法赋予铸造过程神秘色彩，其中“命被鼓延，铸斯无射”将其比作古代音律中至高至善的“无射”之钟，彰显极致尊崇的礼乐地位。钟体的纹饰同样彰显皇家气派，钟顶清牢钹取材于“凡钟欲其声大，故作清牢于其上”的古老智慧，钟身以蔓草祥云为底，环绕飞鹤、走狮、飞龙、飞天等纹样，构成秩序井然的祥瑞图谱。铭文与纹饰共同奠定了景云钟的国家礼器地位，其祈福基因与祥瑞符号为千余年后的“新声”埋下伏笔。

历史回响：动荡后的和平宣言。景云钟诞生之前，唐朝刚经历“韦后之乱”的剧烈动荡，政局不稳、人心浮动。在位仅两年的唐睿宗铸造此钟，绝非单纯宗教行为或艺术创作，而是具有深刻政治意图之举。在乱局初定、百废待兴之际，铸造象征权力与秩序的景云钟，即是王朝的“和平宣言”，向天下宣告动荡时代的终结与新秩序的建立。景云钟的钟声所承载的不仅是音律，更是对休养生息、国泰民安的迫切期盼，注入了“为万民祈福”的核心功能与历史情感。

景云钟成为上千年来新年钟声的必然

从“为万姓祈福”到“为万家祝福”的精神同频。景云钟自诞生便承载着为国家苍生祈福司辰的使命。铭文记载其核心功用，一为“警风雨之辰，昏明之候”，用以公共报时警示；二为“悬玉京而荐福，倡铜史而司辰”，作为连接天人的礼器，为天下万民祈福，执掌人间节律，是唐代皇室最高层级的集体祝福仪式。当下，除夕零点传递的



景云钟(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)

祝福，从个体家庭上升至国家民族的宏大祈愿，亟须一个精神层级与文化分量相匹配的符号承载。景云钟与春晚的契合，正在于“为国家祈福”的精神内核与举国仪式定位的千年共鸣，延续了铭文中“自兹千岁，从今亿春”的永恒使命。

符号契合：祥瑞图谱与吉庆诉求的视觉共鸣。景云钟周身的祥瑞纹饰，构建了与节日祝福高度契合的视觉语义系统。其中，蔓草纹寓意福运绵长、世代永续，祥云纹象征天降祥瑞，飞龙凤舞呼应国家富强祈愿，飞天强化天官赐福意象，仙鹤寄寓长寿康宁，走狮代表威严守护，共同构成覆盖个人安康至国运昌盛的完整祝福体系。在春晚的仪式场景中，景云钟的鸣响仿佛激活了整套祥瑞寓意，使无形的视觉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祝福。选择景云钟，实则是选择了深入民族文化骨髓的吉祥符号体系，实现了现代庆典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衔接。

声学特质：正音与集体仪式的时空契合。儒家礼乐思想认为“礼乐刑政，其极一也”，音乐与制度的精髓在于“和”与礼制的“序”相辅相成。“正音”被视为政治清明的声学象征，“乱音”则预兆礼崩乐坏。景云钟作为皇家敕造的礼乐重器，基音严格遵循唐代“黄钟”律标准，是王朝法定的国家正音，其鸣响既是声波传递，更是对正统秩序的声学确认。在除夕零点这一时序交接的关键节点，景云钟庄重洪亮的正音为新年“定调”，象征新秩序开启，创造出高度凝聚的集体仪式感。尽管现代人已不熟悉传统音律，但“和谐”“秩序”“新生”的文化基因早已沉淀，钟声以超越语言的方式唤醒深层记忆，提供精神慰藉与力量。

媒介特质：文物活化的三位一体。现代录音与传播技术突破了景云钟物理传播的局限，使其声响通过广播电视与网络传遍千家万户。而景云钟能承载国家级声音符号使命，源于三个不可替代的特质：其一，文物价值至高性，作为皇室御制、铭刻皇帝真迹的“天下第一名钟”，具备权威性、文化底蕴；其二，精神内核契合性，“悬玉京而荐福”的基因与春晚全民祈福诉求共鸣；其三，物理功能本质性，钟的形制与声学结构天然适配“新年之声”的转化需求。这三位一体的特质，加之现代技术赋能，使景云钟实现了文物活化的至高境界，即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，将历史祝福融入日常仪式，完成从博物馆藏品到国民听觉符号的转变。

文化认同与博物馆界限的消融

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。在西安碑林博物馆，景云钟作为禁止出国(境)展览的国宝，静静陈列于馆中，千年铜锈仿佛在与观众间筑起历史鸿沟。对多数参观者而言，它最初给人印象是珍贵的历史遗存，其价值多体现在学术层面。当了解到“春晚零点钟声源自此钟”时，国宝遂变得亲切可感。“新年钟声”搭建起连接古今的桥梁，使景云钟从被凝视的文物“客体”，转变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“主体”，实现功能的现代转化，成为文物“活起来”的典范，将千年历史内化为当代国民的文化自信。

听觉“图腾”的塑成。新年钟声已成为深植于民族文化肌理的听觉“图腾”，除夕全家共候钟声的仪式，是融入生活的现代民俗，其情感期待根植于数千年岁时观念，其“祈福”核心寓意与春晚塑造的声波印象，已融入民族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，超越了物质局限，以文化符号的形态，成为中华民族关于时间、团圆与希望的永恒声音遗产，在精神世界中永续回响。

博物馆围墙消融与活化的启示。当代博物馆的使命已从静态保管陈列，转向动态诠释和释放文化能量。景云钟的实践揭示了文物活化的关键路径在于消除隔阂，让文化基因深度融入当代情感与生活。尽管钟声触达亿万民众，但其本体与深厚历史仍不为大众熟知。这提示我们，文物活化需与认知普及同步，要精准提炼文物核心价值，找到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，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。

真正的传承是让文物走出博物馆展柜，以恰当方式融入现代生活，成为滋养当代文化的春雨。当更多文物能找到属于自己的“春晚”时刻，中华文明的智慧将在创新中永续传承，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奏响时代和弦。景云钟的使命，既是千年传承的总结，更是未来文物活化的序章。

本版责编：崔波 王龙霄 甘婷婷